

日本文化在香港

李培德

編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ISBN-13: 978-962-209-798-8

ISBN-10: 962-209-798-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彩印製作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作者簡介	vii
前文 濱下武志	xi
序言 濱下武志	xiv
導論 李培德	xvii

第一部分：早期香港日本文化和社會關係

1. 十九世紀亞洲視野中的香港和日本 3
李培德
2. 從香港日本人墓地碑文看日本人在香港活動
歷史之轉變 27
羅燕妮、陳文耀
3. 日本人在香港的活動與「和書」的流播，
(1868-1945) 65
馮錦榮

第二部分：當代香港的日本文化

4. 日本藝術電影在香港，1962–2002年 95
李浩昌
5. 八佰伴的崛起與香港社會變遷 151
王向華
6. 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的本地化現象原因初探 175
吳偉明
7. 麻婆豆腐與日本壽司——中國和日本的飲食文化
比較〔兼論日本料理在香港流行原因〕 189
陳嘉適

第三部分：香港的日本研究

8. 香港日語及日本研究課程的現狀與展望 219
梁安玉
9. 綜合探討香港的日本研究 235
趙達榮 廖緒豐 何俊英 李浩昌
陳嘉適 王向華 李培德
- 附錄一：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1841–2004〕 259
李培德
- 附錄二：香港日本關係史參考書目 273
李培德
- 鳴謝 287

作者簡介

〔按姓氏筆劃次序排列〕

王向華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畢業，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曾留學日本亞細亞大學，現任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

李浩昌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香港大學文學碩士，日本電影評論家，筆名舒明，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包玉剛圖書館期刊部主任。

李培德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文學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

何俊英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日本慶應大學工學博士，現任日本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國際關係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

梁安玉

香港大學英文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日本研究碩士，上智大學文學博士課程，英國布力斯圖大學博士候選人，現任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副會長。

陳文耀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小學教師。

陳嘉適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京都大學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現任職李錦記國際有限公司市場部。

馮錦榮

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碩士，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趙達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碩士，和東國際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主席，香港留日學友會理事會顧問。

鄭玲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中學教師。

羅燕妮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該系研究助理。

1

十九世紀亞洲視野中的香港和日本*

李培德

一、引言

香港有周星馳，日本有「馳星周」，前者是香港電影明星，後者是日本知名作家。為何這位日本作家要取此筆名，是以表達他對香港文化、電影的喜愛，還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但近十年來日本和香港兩地掀起的文化交流熱潮，則是不爭的事實。令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不僅是日本的流行文化充斥香港，香港的電影、流行曲在日本亦大行其道。值得指出的是，「周星馳」輸出日本後，它的讀音完全改變，既不是粵音Chow Sing Chi，也不是普通話拼音Zhou Xinchi，而是根據日本的漢字音讀法：Hase Seishu，可謂完全日本化。外來文化進入日本並不稀奇，從

*本文是筆者對日本人於亞洲社區網絡研究的一項嘗試，要感謝下列人士的支持和鼓勵，包括譚汝謙和濱下武志兩位教授，使我開始認識和對這研究課題的興趣；本文的部分觀點，曾於2002年10月由澳洲國立大學Asian Studies in Asia Participation Scheme主辦的Workshop on Frontiers of Asian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和同年11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退修會上發表，要感謝Tessa Morris-Suzuki教授和黃紹倫教授，與及亞研其他同袍所給予的批評和建議；最後，得到日本住友財團提供2003年度「アジア諸国における日本関連研究助成」資助，研究計劃名稱「貿易と移民のネットワーク：1870年代から1930年代の香港、上海、シンガポールにおける日本人社会」，謹此一併致謝。

古以來，日本一直在吸收外來文化，但是必須經過日本化這一過程，最終變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香港從1841年開埠到現在，已有160多年的歷史，香港的地理位置在亞洲，但我們的思想卻在歐洲。香港與亞洲，雖然有很密切的社會經濟關係，但我們的注意力卻放在亞洲以外的地方。坦白說，香港的「亞洲脈絡」、「亞洲價值」是甚麼？相信不會有很多人關心。香港人的生活，雖與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息息相關，但我們的價值觀卻驅使我們「反認同」，在「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思想影響底下，我們是不太容易有客觀和正面的「亞洲價值觀」。

除了「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之外，「中國中心論」〔China-centrism〕亦一直干擾我們對接受亞洲文化的態度。一般來說，香港文化界、社會媒體無不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城市，而鮮說「東西文化」。究竟「中西」〔Sino-Western〕和「東西」〔East-West〕有甚麼分別呢？為何我們只把中國和西方相比較或對壘呢？難道中國文化等同整個亞洲文化嗎？¹ 因此，說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還是比較恰當的。事實上，我們一直被這種「中國中心論」〔China-centrism〕的價值觀所主導，即中國文化代表了所有的東方文化。當然，亞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元文化。如眾所周知，亞洲近代歷史之變化，起源於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香港歷史的新一頁，但對日本亦產生了重要影響，日本的對外開放，間接因為中國和香港。現在，我們研究香港和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因外部壓力而開放的歷史，都

會分別以鴉片戰爭、明治維新為起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本文要討論的香港和日本的關係、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貢獻等，正恰恰在香港開埠之後和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即1841至1868年的二十多年間所發生的。別小看香港在開埠後短短二三十年間的發展，香港所代表的「揉合」東西文化，正是日本當時現代化過程中所急於仿效的。

二、十九世紀亞洲國際秩序的重整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日本都奉行保守的封閉政策，中國於明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海禁，而日本則因於1637年島原之亂實行鎖國。有趣的是，中日兩國在所謂「自我閉鎖」的政策下，對外界的接觸並未完全中斷。除了廣州和長崎被闢為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外，通過各種不同方法獲取外界消息。

從本書所附〈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來看，1845年有四名日本「漂流民」來港定居，打開了港日關係史的新一頁。這些被稱為漂流民的日本人，為何會來到香港？到底漂流對他們來說有是甚麼含意？當時日本實行鎖國，如無日本官方的許可，日本國民不可出海，不可離開日本國土。此外，還規定擅自離開國土的日本人，將不會承認其國民身分。因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一旦離開國土就等於永遠離別家鄉。

雖然是海禁、鎖國，但不意味這兩個國家對外界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中國在康熙年間實行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對外貿易均集中在廣州進行，英國等外國使節來華均須

經過廣州。日本的做法與中國相類似，中、日兩國的政策有不少相同之處。日本則通過長崎，規定唐船、蘭船（指從荷蘭來的船隻），及少部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預先得到日本政府同意下，來日進行有限度的勘合符貿易。勘合符者，意謂這次來日貿易完畢，便發給一張半截符契作為憑證，待下次再來航時，便可以此半截符契對勘。一般人都會有一個錯覺，以為日本鎖國，對外界便一無所知。其實不然，位於日本南端的長崎港，由長崎奉行（即今天的行政長官）管轄，他要求所有到長崎泊岸船隻的船長，在登岸後必須向他匯報航行期間所經歷和觀察到的各地情況。長崎奉行會根據這些所見所聞，整理成為一種文獻稱為《風説書》，呈閱位於江戶（東京）的最高統帥幕府大將軍。換言之，日本幕府只要坐鎮中央，不須出外航海，便可掌握亞洲的各國情報。為甚麼日本會特別關心亞洲？這不僅因為中國曾於元、明時攻打日本，更因日本是一個位於亞洲東北角的邊陲國家，她必須了解亞洲所發生的事情來釐定或調整自己的國策。

上文提及的日本漂流民，所謂「漂流」，筆者懷疑只是一個說詞，因為不能合法出國，所以只能說是因天氣影響，被颱風「吹」離本國。這幾名日本漂流民先漂流至澳門，然後來香港。很明顯，他們亦會為自己的將來打算，當時香港已經開埠，英國人想把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商貿城市，把他們吸引到香港發展。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主要以朝貢關係來維持其與亞洲國家的關係，這被稱為「華夷秩序」的國際關係，成為亞洲國際秩序的重要一環。參加朝貢的藩屬國尊稱中國為

宗主國，中國的皇帝為天子，自己為屬國，為中國天子的臣子。根據濱下武志的研究，中國要維持這種國際關係，需付出不少經濟代價。中國從朝貢國所得到的貢品，往往要加倍奉還，以表達天子的恩澤。² 並且，朝貢制度並非適用於籠絡所有亞洲國家。首先，日本並沒有參加；其次，作為中國的藩屬，琉球既向中國稱臣，但同時亦派遣使節去日本，實行兩面拉攏；第三，中國另一屬國越南，要求寮國〔今天老撾〕向她稱臣，當然並未得到中國的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僅一直沒有參加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國際秩序體系，相反在豐臣秀吉時代〔1537-1598〕，更要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總督和果亞的葡萄牙殖民總督向日本派遣朝貢使節，嘗試在中國以外創立另一個亞洲國際關係的系統，與中國抗衡。顯然日本對中國於亞洲的舉動，是十分留意的。毫無疑問，當鴉片戰爭把亞洲原來的國際秩序加以破壞時，日本很自然就會想到中國在被打倒以後，到底今後由誰來代替她的位置，這不僅影響到日本的自身安全，更令人擔心今後由誰來主宰亞洲國家的命運，這影響對日本來說是震撼的。鴉片戰爭之後，1853年太平天國攻陷南京，挑戰清政府之統治，加上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令到中國皇室要出走西安，使日本幕府益加相信只有選擇對外開放，早日實行國家現代化，纔能避免重蹈中國之厄運。

日本雖然於1637年起實行鎖國，斷絕民間與海外的一切交通，但不等如幕府不能知道海外所發生的事情。由長崎奉行根據來航商船的航行過程報告撰成《風說書》，向幕府將軍呈遞。這種有關海外情報的文獻，現在仍保存

於日本。據統計，於1840至1844年間，共有19件的《風說書》是討論中國如何禁鴉片、英國在中國的軍事侵略、《南京條約》內容等事情。可想而知，日本對中國、亞洲動態的情報，是非常重視的。作為天朝大國中國竟然會敗給細小的英國，令日本舉國震驚。當然，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割讓的殖民地，日本是不會不加留意的。此外，因鴉片戰爭對原來亞洲國際秩序的破壞，日本出現了一種國家危機意識，由《風說書》所提供的資料而後來寫成的《海外新話》和《海陸戰防錄》，都是提倡日本國人應有危機意識，對以後日本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³

下文表一羅列了十九世紀香港、上海、橫濱於對外開放過程的比較，三地之中，以香港開放最早，給予西方的特權最多，上海次之，橫濱再次之。由於是自我開放和被迫開放的性質不同，橫濱比之上海和香港，都保留更多的自主權。例如外國人居留地（中譯租界）的地位於橫濱開放四十年後被取消，上海是一百年，而香港則是一百六十多年。在開放權力方面，日本比起中國並未有在軍事、法律、關稅、鴉片買賣等對西方給予太大的讓步。顯然，中國和香港的遭遇已經成為日本的一個警惕，如果再固步自封，將來難逃淪為殖民地之命運。

至於在城市發展方面，從十九世紀開埠時起，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從未中斷。作為亞洲現代化大都市，橫濱如何吸收香港的經驗，將在下文討論。值得提出的是，十九世紀亞洲城市發展和對外開放，似乎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正如本文附表〈香港、上海、橫濱現代城市發展比較〉所列，可留意以下幾點特

點：城市範圍擴大之方法，此其一；現代都市設施的逐一出現，此其二；外國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影響的表徵，此其三；象徵城市發展的標誌性建築，此其四；對內和對外之交通網絡，此其五；中外文化融合和衝突，此其六。

表一：香港、上海、橫濱對外開放之比較

	香港	上海	橫濱
開埠年份	1841年	1843年	1859年
主權回歸年份	1997年	1943年	1899年
政治地位	殖民地	租界〔1845〕	居留地
鄰近城市	廣州、澳門	蘇州、南京	江戶〔東京〕
背後腹地	廣東省	江蘇省	神奈川
外國人傳教	自由	由清政府保護	只限簽約國
軍事	英國駐守	英軍艦自由入港	保留自主權
內地旅行權	自由	自由	有規定範圍
自治權	殖民地政府	租界工部局	含糊〔共同管理〕
關稅權	殖民地政府	外國人總稅務司	保留自主權
鴉片貿易	合法	合法	禁止
法律	維多利亞地方法院〔1841年〕 高等法院〔1844年〕	英租界工部局〔1854年〕 會審衙門〔1864年〕	含糊〔但有治外法權〕

三、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貢獻——兩位受日本皇室嘉許的香港人

香港和日本由於有着不同的歷史發展背景，往往成為影響兩地關係的主要因素。早於十九世紀日本摒棄鎖國政策時起，為求早日達到現代化目標，實行明治維新，由過去向中國轉移向西方學習，香港在這歷史轉折的過程中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香港的城市現代化歷程比日本為早，不僅有完善的海港設施，更有先進的通訊設備和大眾傳播媒體，因應了外國商社、傳教士和知識份子的各種要求；第二，香港地理位置適中，更由於外貿的關係，香港與倫敦、與三藩市的海上航線，都較早發展，並且吸引了不少船公司在香港開展亞洲區業務。

雖然於日本和美國於1854年簽訂通商條約，但日本第一個開港城市橫濱遲至1859年才正式開放，比香港開埠晚17年。在對外航運交通方面，香港遠比日本發達。早於1849年，香港已設有到上海之航線；1850年到倫敦航線。到1864年，從上海可到橫濱，1867年更可到三藩市。與香港相比，日本的海外航運發展較遲。日本要到1875年才有到上海之航線；1879年到香港之航線。⁴可以肯定的說，香港是日本連接歐美二洲的重要航運樞紐。據考證，在幕末到明治維新前夕的合共七次的派遣外交使節，計1860年新見正興到美國、1862年竹內保德到歐洲六國、1864年池田長發到法國、1865年柴田剛中到法國、1866年小出秀實到俄國、1867年小野友五郎到美國、1867年德川昭武到法國等，無不先取道香港。這批代表日本政府高層的人士，或在去程時在港中轉，或在回程時在港停留訪問〔參看本書〈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他們把在港的所見所聞帶回本國，說香港是日本接受外界訊息的重要渠道，並不為過。就算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對外交通航運仍然依賴外商航運公司時，香港仍扮演重要角色。

岩倉使節團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已為一般史家所公

認，需要指出者，使節團不僅遊歷歐美諸國，在歸國回程時也遊歷了好幾個亞洲國家和城市，並作深入和認真的考察。使節團於1871年12月離開日本，1873年8月經果亞、新加坡、西貢抵達香港，停留兩夜三日後去上海，於9月初返抵長崎。雖然岩倉使節團的重要歷史意義在於明治初期日本對歐美國家的考察，但使節團在歸航途中所經過停留的都是西方列強於亞洲的殖民地或租界。不難想像，使節團所獲得的印象顯然是亞洲備受西方列強控制，對日本毫無疑問是一種「威脅」，間接加促日本成為現代化強國的步伐。



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兩名日本使節在香港拍下的照片。相片中人面向西人攝影師表情各異，一人比較寬容、隨和，一人則較緊張，手握起拳頭。照片由美國攝影師Milton M. Miller所拍，由高添強先生提供。

要達到現代化，必須先了解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語文翻譯似乎是首要處理的問題。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英對照的教科書《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第一份專門介紹西方事物的中文刊物《遐邇貫珍》，和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都受到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視。於明治維新前由日本高級知識份子進行研修的機構「蕃書調所」抄錄成日本版，於1853年刊印成《遐邇貫珍抄本》，1859年成《官版香港新聞》，於日本廣泛流傳。⁵另外，由香港德藉傳教士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編纂的《華英字典》，於1866年開始刊印，亦受到日本政府和知識界的注意，不少英文詞彙的漢譯，例如「銀行」一詞，便出自這套《華英字典》。⁶

1854年，香港開埠後十三年，當美國開赴日本的培理〔Matthew C. Perry〕艦隊停泊香港等待補給之際，香港居民羅森，字向喬，原是廣東南海人，得老師外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介紹，登上艦隊，充當美日之間的翻譯，協助美國打開日本鎖國之門。由於羅氏曾參予商訂《日美汽船通商條約》，成為歷史上第一位與日本官方接觸的香港華人，最終獲得日本朝野的尊敬。羅氏所著的《日本日記》，⁷後來被衛三畏翻譯成英文，收入《培理艦隊日本遠征記》，也為近代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日本見聞錄。⁸為甚麼羅森會被選中參與美日和談？他的英日語水平又如何？引起筆者很大的興趣。據現存衛三畏的資料顯示，培理當時認為衛三畏的日文水平足以當艦隊的翻譯，但他卻沒有太大的信心，所以有求於羅森，但對羅倚重的是漢語而非日語，例如衛三畏對羅的表現加

以評價時寫道：「我的中文秘書羅先生向我打聽有關中國的消息。…羅很有才華，他常常在日本人的扇子上題詩，並和許多日本人交上了朋友。他和日本人交流一般是通過『寫』的方式來進行，因為很多日本人能看懂中文，也能寫中文，但是不會說。」又，「羅對工作很有熱情，與當地人相處也很融洽。在當地人看來，羅先生是他們見過的最博學的中國人。自羅在他們的扇子題下優美的詩句以後，他們就願意與他切磋中文了。」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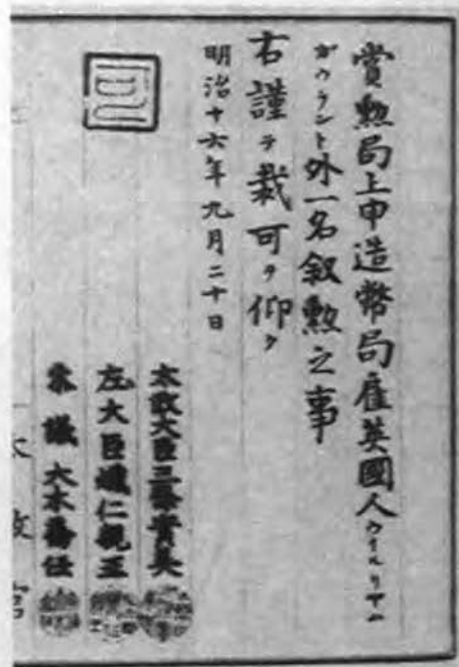
由於羅森曾著有《南京紀事》一書，紀錄了太平天國於南京的情況，後來日本大思想家吉田松蔭將此書譯為日文，書名改為《清國咸豐亂紀》。這書影響極大，使日本朝野明白，作為天朝大國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如何開始衰落，地方動亂已是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羅森的名字很可能在日本已是為人熟悉。羅氏作為華人知識份子，乘美國軍艦前去日本叩關。當然，在美國來說，培利艦隊的叩關是相當成功的，因為完全不需武力便與日本簽訂《日美親善條約》。日本願意開放部分港口與美國通商，容許美國人進入日本。這是一條重要條約，它打開了日本的國門，而其他歐西國家例如法國、葡萄牙等，無不續以《日美親善條約》為藍本，向日本要求幾乎相同的條款。故此，我們仍不得不說，1854年羅向喬隨美國培利艦隊到日本，協助日本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使日本不得不打開國門。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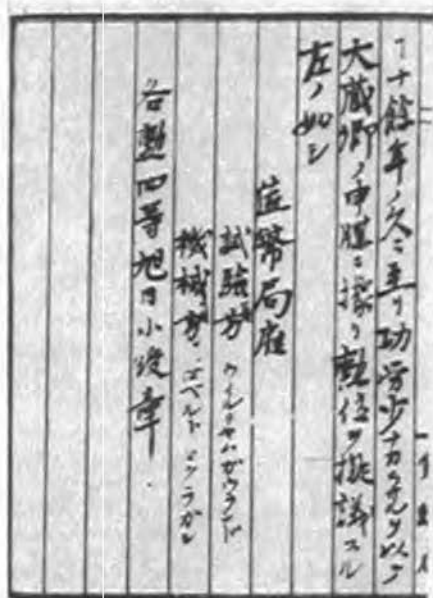
不少人覺得羅向喬是一個偉大人物，因為他是第一個中國人，也是第一個香港人打開了日本的國門，影響日本近代史的發展。羅向喬並且將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寫了一部

《日本日記》，這書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部由中國人以中文撰寫研究日本的著作，評價甚高，筆者並非要反駁，但欲指出羅氏見重於日本朝野並不是他的高超英語或日語水平，而是漢語，當培利艦隊抵達日本，日本的官員去問羅氏有否到過美國，他答道：「我在船不過三月也，但我不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義。」這一句話可謂十分精景。到底是他不會英語，還是他在船上地位低微，沒有說話的資格？羅氏身為中國知識份子，所到之處均受日本漢學家歡迎，但問題是他怎會乘上夷船，幫助夷人來欺負受儒家思想洗禮的日本？因此，筆者相信「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義。」這一句話的真正意思，實為羅氏為自己轉圓。其實，羅向喬到了日本之後，結識了一大批日本政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他與這些人的交往一直維持到1860年代。據說，日本天皇還贈送了幾幅名畫給他，及禮聘他為日本政府顧問。看來羅氏是非常成功及有影響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羅氏是不諳日語的。羅向喬是清代傳統的知識份子，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漢學地位和價值觀主宰着整個日本的上層社會。換言之，羅接觸日本的文化人士，猶如見到自家人。大家閱讀的儒家經典、欣賞的事物大抵相同。無論如何，畢竟羅氏訪日結束後確實帶來一些影響，他把日本北海道出產的昆布首次帶回中國。羅跟隨艦隊不僅去了橫濱（橫須賀），還去了北海道，並從北海道帶回一些昆布樣本回廣東、香港。羅氏離開日本後，有好幾位廣東商人便拿着他帶回來的昆布樣本到日本採購。¹¹

明治維新伊始，日本實行經濟改革，急需建立新的現

代金融體制，取代幕末以來紊亂的金融制度，香港在這方面作出不少貢獻。當時於大阪新建的造幣寮即後來的造幣局，發行十進制新貨幣，所用的行政管理人員、工程師、機器、設備、廠房建築設計等等，均來自於1868年倒閉的香港造幣局〔Royal Hong Kong Mint〕。當時日本新鑄的貿易銀元，其貨幣單位「圓」的名稱，與本港當時的流通貨幣「圓」有很密切關係〔現在通用的「円」是「圓」的略字〕。新的貨幣推出後，香港的匯豐銀行曾協助其在亞洲多個城市流通，¹² 日本政府更嘗試說服英國使之成為香港的合法流通貨幣，可惜最後並沒有成功。¹³





原香港造幣局職員獲推薦頒授日本皇室勳四等旭日小綬章的官方文件

造幣廠出售過程頗為複雜。先是日本派遣一個代表團來港考察，了解造幣廠選址、入口、建造等情況。日本學習新事物的態度是相當認真和徹底的，除生產設備外，往往配套購入人材管理等其他軟件。筆者曾撰文考察大阪造幣寮的建築規格，發現跟位於香港銅鑼灣東角的造幣廠完全一樣。在人材管理方面，日本更以高薪聘請原造幣廠的全部舊工作班子，包括首長Thomas William Kinder，還有負責溶解、總管，雕刻、會計、醫生、修理等的各級人員。

結果，香港的貨幣，無論其成色、規格、樣式，甚至單位名稱，全部被引入日本。不過，當這些新造貨幣要向海外流通時，英國政府卻拒絕日本的要求，不讓「日圓」成為香港的合法流通貨幣。¹⁴

四、日本的香港網絡——失落和挫折

香港成為日本汲取亞洲情報的主要渠道，已於上文討論。除了情報網絡外，香港對日本的海外移民、開拓海外市場、貿易貨幣之流通等等，都扮演很重要角色。可是，日本對香港網絡的發展，雖然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並不是路路暢通，相反卻遇上不少阻力。

香港於1894年發生很嚴重的流行疫病，死亡無數，特別是平民百姓，政府束手無策。由於疫病橫行，很多人都放棄香港，遷移到內地居住。由於疫症猖獗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又沒有治療方案，日本對此表現得大為緊張，雖然傳染病不一定會馬上傳到日本，但日本極為擔心，因為香港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貿易港口。香港有難，橫濱、東京、神戶亦難獨善其身。當時，有兩位日本傳染病專家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來港研究傳染病菌。後來，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病菌，但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書記載甚少，因而目前史學界還未有一致的觀點，到底香港的鼠疫病菌是由北里柴三郎還是香港政府的外籍醫生首先發現？相信還有待更進一步的考證和研究。這兩位專家來港後，首先發現是鼠疫病菌作惡，而青山胤通卻因接觸疫菌而病倒。很可惜，有關他們在港的經歷和

對香港醫療上的貢獻一直被埋沒於歷史陳跡之中，而有關他們在香港研究病菌、治病、施行臨床實驗的德、日、英文紀錄，並沒有專人去搜集。

在整個明治時代裏，香港的日本人口一直在增加。有趣的是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香港的日本人社會早於十九世紀已經出現，現在位於跑馬地的外國人墳場還可見到為數不少的日本人墓碑。¹⁵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一些日本婦女，出身於日本九州的窮困鄉村，俗稱「唐行」〔*karayuki-san*〕來香港當娼妓謀生的歷史。¹⁶到底這些人是怎樣來到香港，到港後又與本國維持一種怎樣的「網絡」關係？她們到香港後是否還會移動到中國、東南亞其他國家？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我們深入去研究。現在香港的保良局保存了不少有關日本婦女來港時求助的檔案資料，對我們了解這些被拐賣的日婦問題，應該有所幫助。¹⁷

除了「唐行」選擇香港作為海外謀生地外，日本不少商社亦曾努力拓展香港市場，大力發展海外貿易，香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發展基地，但是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滿意的成績，例如：広業商會，於1878年進入香港，1882年退出；三井物產，於1878年來港，1882年退出；三菱汽船，於1879年來港，不到幾年，便於1884年退出等等。還有，從香港輸入機器、技術和管理人才在大阪生產的日本「貿易銀」，日本政府最早於1877年提出，經多番磋商，雖獲港府同意但始終不獲英倫批准在港流通，於1879年被第一次正式拒絕〔參看本書〈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由此可見，日本人拓展香港市場的雄心曾遭遇極大之挫折。有關這一點，當時的日本駐港領事鈴木充美曾作以下的三

點分析，歸納日本未能成功拓展香港市場的原因：一者，香港的華商團結力甚高，外人根本無法進入；二者，日本商人欠缺足夠的資本，很容易倒閉；三者，香港的華商直接與日本的製造商聯繫，毫不需要在港的日商作中間人角色。¹⁸ 日本商人在港不敵本地競爭對手，多少反映出香港當時的營商環境，是如何受本地商人群體的壟斷。

據東亞同文會香港廣東駐在調查班於1906年所撰寫的調查報告書指出，香港的日本人社會並不團結，分「上町連」、「下町連」兩部分。蓋前者包括政府官員、商社職員及其家屬，至於後者包括一般普羅大眾、小市民，兩個階層互不往來，存有嚴重的社會階層分歧。¹⁹ 相對於香港本地的華人社會，香港日本人社會內部不團結，這是否對日本本國商社在香港開拓市場失敗有關，相信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五、結語

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由於鎖國的影響，近代日本對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充其量通過長崎這一貿易窗口，以了解外界的消息，似乎已欠缺足夠的說服力。在鴉片戰爭以後，香港急速冒升，在城市現代化、汲取西方文化知識、對外交通和資訊網絡各方面，都比日本先進，成為日本借助參考的地方。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是從中國割讓出去的，這一點日本亦十分清楚，從某個意義上說，香港已成為日本開放的一個警惕。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列強正虎視眈眈，日本如不欲步上中國後塵，必須面對現實，馬

上開放國家，迅速發展國家現代化政策。有趣的是，當日日本於1895年佔領台灣之後，英國對香港殖民地的成功統治經驗，又成為日本政府領導人管治台灣的一個參考典範。²⁰眾所周知，歐洲對近代亞洲歷史產生不少重要影響，因而把我們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扯到歐亞關係上，從而忽略亞洲地區的內部關係，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²¹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和地理因素，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作用。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其實，香港與日本有着很密切的交往，如果我們細心翻查歷史，便會發現早於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不久，在這個剛開闢的維多利亞新城裏，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從香港開埠到現在的160多年歷史裏，港日關係可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括而言，在十九世紀香港一直扮演着日本於亞洲汲取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國動態的「網絡」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大膽地說，日本通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與香港連接，亦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日本不得不重視香港。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鴉片戰爭可謂是破壞原來亞洲秩序的一個源泉，隨朝貢秩序破壞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度、東南亞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的中國人網絡外，多加了來自歐洲特別是英國的網絡。朝貢制度雖然崩潰，但中國人的網絡並沒有消失，華裔移民滲透亞

洲每一個國家，部分華商更與歐洲殖民勢力相結合，借助其於亞洲的影響力，將華人網絡延伸開去。日本是一個獨特的亞洲國家，她不僅沒有參加中國的朝貢體系，在豐臣秀吉時代，更要求在馬尼拉和果亞總督向日本稱臣和差遣朝貢使節。此外，日本與中國的藩屬琉球一直保持着微妙的關係。面對中國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網絡，日本不可能沒有反應，因此將二十世紀前半的亞洲歷史解釋為日本對這種網絡壓力的反撲，並非沒有道理。基於以上所說的背景下，到底日本是如何開始挑戰英國在香港、華南的統治勢力，將是筆者今後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²²

附表：十九世紀香港、上海、橫濱現代城市發展比較

年代	香港	上海	橫濱
184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開埠〔1841〕 · 維多利亞地方法院〔1841〕 · 宣佈為自由港〔1842〕 · 皇后大道命名〔1842〕 · 成立商埠設計委員會〔1842〕 · 維多利亞城命名，香港政府成立〔1843〕 · 成立高等法院〔1844〕 · 三軍司令官邸完工〔1846〕 · 成立香港俱樂部〔1846〕 · 美利樓〔Murray House〕〔1846〕 · 聖約翰大教堂竣工〔1849〕 · 香港上海定期航線開設〔184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上海開埠〔1843〕 · 上海外灘〔Bund〕租地開始〔1844〕 · 英國上海租地章程頒布和設定租界〔1845〕 · 設置英國租界擴大道路碼頭委員會〔1846〕 · Flag Staff House〔1846〕 · 聖三一教堂奠基、建立英國領事館〔1846〕 · 外灘出現24間外國洋行〔1847〕 · 英國租界擴大〔1848〕 · 美國要求設立租界〔1848〕 · 設置法國租界〔184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442年，橫濱村首次出現於歷史文獻，於幕末時期為德川氏領地，為不知名漁村
185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維多利亞城填海開始〔1851〕 · 規劃大規模填海區〔1854〕 · 港督府竣工〔185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上海倫敦定期航線開設〔1850〕 · 《北華捷報》創刊〔1850〕 · 小刀會起義，佔領縣城〔1853〕 · 上海外貿數量超越廣州〔1853〕 · 頒布第二次土地章程〔1854〕 · 設置英國租界工部局〔1854〕 · 中國人准許入住租界〔1855〕 · 亞羅號事件，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 外灘初期江海關〔1857〕 · 中英天津條約〔185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美國培理艦隊叩關〔1853〕 · 美國培理艦隊再次來航，簽訂日美親善條約〔1854〕 · 日英親善條約〔1854〕 · 日俄親善條約〔1855〕 · 日荷親善條約〔1856〕 · 日本與美、荷、俄、英、法簽訂修好通商條約〔1858〕 · 橫濱城市規劃初期方案〔1858〕 · 橫濱開港〔1859〕 · 橫濱村改稱橫濱鎮〔1859〕 · 英一番館怡和洋行；美一番館瓊記洋行；美二番館寶順洋行〔1859〕

186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割讓九龍半島〔1860〕 · 維多利亞城畢打街鐘樓建成〔1862〕 · 成立中央書院，先後改稱為維多利亞書院及皇仁書院〔1862〕 ·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成立〔1865〕 · 香港酒店竣工〔1867〕 · 香港大會堂竣工〔1869〕 · 成立東華醫院〔186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太平軍攻擊上海，英法聯手防衛〔1860〕 · 法租界擴大〔1861〕 · 法租界設置公董局〔1862〕 · 成立常勝軍〔1862〕 · 美國租界定界章程頒布〔1863〕 · 英、美租界合併〔1863〕 · 「North China Daily News」創刊〔1864〕 · 設置會審衙門〔1864〕 · 建立江南製造局〔1865〕 · 共同租界成立上海煤氣公司〔1865〕 · 上海吳淞通行電報〔1865〕 · 上海橫濱航線開始〔1866〕 ·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上海分行〔1866〕 · 德國俱樂部〔1866〕 · 上海三藩市定期航線開設〔1867〕 · 《萬國公報》創刊〔1868〕 · 英租界天主教堂〔1869〕 · 上海第三次土地章程〔186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橫濱道通行〔1860〕 · 居留地成立，填水田工程開始〔1861〕 · 「Japan Herald」創刊〔1861〕 · 爆發生麥事件〔1862〕，英國調遣駐香港海軍到鹿兒島鎮壓 · 幕府軍艦千歲丸抵上海〔1862〕 · 幕府准許英法駐屯軍隊〔1863〕 · 爆發薩英戰爭〔1863〕 · 英美法荷四國聯合攻打下關〔1864〕 · 英商P & O郵船公司開設橫濱上海定期航線〔1864〕 · 建立橫濱製鐵所〔1865〕 · 幕府准許日本人出國〔1866〕 ·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橫濱分行〔1866〕 · 改造居留地及跑馬場墓地〔1866〕 · 德國領事館〔1866〕 · 居留地擴大〔1867〕 · 美商太平洋郵船公司開設三藩市橫濱香港定期航線〔1867〕 · 東京橫濱通行電報〔1867〕 · 制定中國人戶籍制度〔1867〕 · 英國公使館〔1867〕 · 設置橫濱裁判所〔1868〕 · 美國公使館〔1869〕
------	--	--	--

187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敷設香港上海海底電纜〔1870〕 · 維多利亞城火災〔1878〕 · 香港橫濱定期航線開設〔187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上海香港通行電報〔1870〕 · 敷設上海倫敦海底電纜〔1871〕 · 《申報》創刊〔1872〕 · 沙遜洋行〔1872〕 · 外白渡橋竣工〔1873〕 · 中國輪船招商局成立〔1873〕 · 租界引入人力車〔1874〕 · 英國郵政局〔1874〕 · 設立格致書院〔1876〕 · 英商敷設淞滬鐵路〔1876〕 · 拆毀吳淞鐵路〔1877〕 · 聖約翰大學〔187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橫濱市街地實測〔1871〕 · 橫濱新橋鐵路通車〔1872〕 · 法人開設歌特劇院〔1872〕 · 橫濱海關〔本町道〕〔1873〕 · 格蘭酒店開業〔1873〕 · 橫濱郵政局〔1874〕 · 東京丸抵上海〔1875〕 · 橫濱上海定期航線〔1875〕 · 橫濱港修建規劃〔1875〕 · 爆發西南戰爭〔1877〕 · 中國領事館〔1878〕 · 外國人居留地日本大道以下三十條街命名〔1879〕
188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土地章程頒布〔1885〕 · 建立維多利亞女皇像〔1887〕 · 山頂纜車通車〔188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上海天津通行電報〔1880〕 · 設立中西書院〔1881〕 · 設立上海電力公司〔1882〕 · 敷設公共租界自來水水管〔1882〕 · 公共租界開始供水〔1883〕 · 中法戰爭〔1884〕 · 外灘氣象信號塔〔1884〕 · 外灘範圍擴大〔188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橫濱正金銀行開業〔1880〕 · 橫濱YMCA〔1884〕 ·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開業〔1885〕 · 第一次官派移民夏威夷〔1885〕 · 橫濱海關〔海岸道〕〔1885〕 · 敷設自來水水管〔1887〕 · 港口建設工程動工〔1888〕

189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環填海及港口 建設工程動工 〔1891〕 · 港督府改建 〔1891〕 · 高街精神病醫院竣 工〔1892〕 · 香港俱樂部竣工 〔1897〕 · 租借新界〔189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橫濱正金銀行上海 分行〔1893〕 · 《新聞報》創刊 〔1893〕 · 外灘第二期江海關 〔1894〕 · 中日簽定航海通商 條約〔1895〕 · 設立上海市馬路 工程局〔1895〕 · 工部局市政廳 〔1896〕 · 法國領事館 〔1896〕 ·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 〔1897〕 · 商務印書館成立 〔1897〕 · 吳淞開埠〔1898〕 · 頒布租界第四次土 地章程〔1899〕 · 英、美共同租界誕 生〔189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橫濱貿易新報》 創刊〔1890〕 · 中國北洋艦隊途經 橫濱〔1891〕 · 指路會教堂 〔1892〕 · 日本郵船公司橫 濱孟買航線通航 〔1893〕 · 橫濱港大棧橋竣工 〔1894〕 · 日英簽定航海通商 條約〔1894〕 · 設立橫濱商業會議 所〔1894〕 · 取消居留地 〔1899〕 · 第二期港口建設工 程開始〔1899〕
------	---	--	--

資料出處：橫濱開港資料普及會編《橫濱和上海——兩個開港城市的近代》〔橫濱：橫濱開港資料館，1993年〕；張在元、劉少瑜《香港中環城市形象》〔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7年〕。

註

1. 周佳榮〈關於亞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氏著《亞太史研究導論》〔香港：利文出版，1999年〕，頁3-9。
2. 濱下武志著《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50。
3. 詳見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頁8-16。
4. 片山邦雄《近代日本海運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96年〕，頁15-27。
5.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頁78-101。

6. 例如銀行等經濟、金融詞彙，便源出於該套字典，參閱立脇和夫《在日外國銀行史》（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7年）。
7. 詳見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羅森著〈日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9-46。有關羅森與香港關係，可參考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驅羅森〉，載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第五輯（1995年），頁141-151。
8. 陶德民〈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對日人權外交的啟示——寫在日本開國150周年之際〉，《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4月號，頁48。
9. 衛斐列著，顧鈞、江莉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08-109；130；136。
10. 羅香林〈香港開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羅向喬事蹟述釋〉，《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71年），頁289-293。
11. 參閱斯波義信編〈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2號（1982年）。
12. 參閱Takeshi Hamashita,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ilver yen and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1871-1913," in Frank H. H. King (ed.),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3), pp. 321-349.
13. 參閱拙文〈香港造幣廠與大阪造幣局〉，載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頁573-589；〈明治日本に於ける貨幣の改革と香港〉，《季刊歷史海流》第3卷第3號（1997年7月），頁19-28。有關的過程，可參閱本書附錄〈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表〉。
14. 拙文〈香港造幣廠與大阪造幣局〉，頁587-588。
15. 可參考本書羅燕妮、陳文耀〈從香港日本人墓地碑文看日本人在香港活動之歷史轉變〉及赤岩昭滋〈香港的日本人墓地〉，載譚汝謙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1845年至1987年》（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1988年），頁132-141。
16. 陳湛頤〈香港早年的日本娼妓〉，載原武道、陳湛頤、王向華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33-152。
17. 可兒弘明《近代中國の苦力と「豬花」》（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
18. 奧田乙治郎編《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台北：台灣省熱帶產業調查會，1937年），頁276-281。
19. 飯島涉〈香港—日本關係のなかの香港日本商工會議所〉，載波形昭一編著《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經濟團體》（東京：同文館，1997年），頁192。
20. 吳密察〈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編《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3年），頁1-27。
21. 參閱濱下武志著〈香港於東亞史上的位置〉，載《創文》第320號（1991年），頁4-5；濱下武志著《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東京：筑摩書房，1996年），頁65-66。
22. 參閱房建昌〈本世紀上半葉日本及台灣總督府在潮汕的活動〉，《汕頭大學學報》第14卷第4期（1998年），頁89-94。

鳴謝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首先，要感謝兩次「日本文化與社會」講座的所有主講人，除了本書的作者外，還有：王慶新、林少玲、林泉忠、洪志輝、張展鴻、趙雨樂。他們都是研究日本問題和港日文化社會關係的專家，可惜由於時間和篇幅所限，編者未能全部向他們徵稿。兩次講座能夠辦得成功，本書各論作者都犧牲了不少寶貴的工作時間，為講座或本書文稿作出各種形式的準備，在今日香港學界備受資源增值和學術評審的壓力情況下，是難能可貴的。本書收錄的部分論文初稿，曾以「港日關係史」專輯，刊載於《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四十周年特刊》〔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2002年〕，頁116-209。需要指出者，本書收錄的論文都經過原作者的重新修訂。

支持本書出版和協助組織兩次「日本文化與社會」講座的，包括以下各位人士和機構：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周亦卿先生、趙達榮先生、馬鐵穎先生、鄭廣才先生、侯清儀先生、許淑文小姐；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楊建明教授、沈雪明博士、卜克〔Richard Booker〕先生、陳以漢先生、梁美瓊小姐、陳慧嫻小姐；

香港大學出版社張煌昌先生及兩名書稿評審人；
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濱下武志教授；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黃紹倫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林啓彥教授。

此外，曾經接受我們訪問的前香港駐日經濟貿易代表處處長藍鴻震先生、導演許鞍華女士、香港創價學會會長李剛壽先生、天理教香港佈道中心會長大向良治先生、第一日文專科學校校長李澤森先生、熱心推動香港對日索償運動的已故杜學魁先生、專欄作家一條小百合小姐、香港戰史專家高添強先生、都市田園書店范永康先生等，並為本書提供資料和圖片的福光博一先生和高添強先生，謹此一併致以謝忱。

本書付梓之際，本書作者之一廖緒豐不幸因病逝世，我們痛感惋惜之餘，對於過去他對本書的支持，謹致衷心的謝意和懷念。